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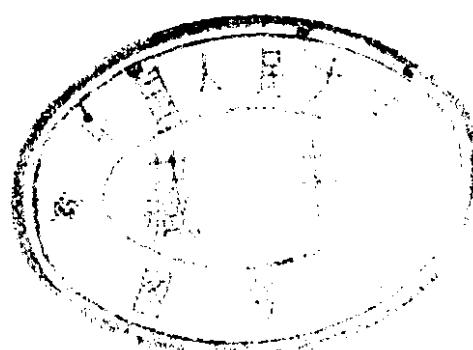
尚誠文集



11(2)/56

1139479

高鐵文選
花之集



人 天 大 版 社

封面设计：倪天煦

尚钺史学论文选集

Shangyue Shixue Lunwen Xuanji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9 印张 460,000 字
1984 年 5 月第 1 版 198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400

书号 11001·638 定价 3.05 元



15 / 84

第三章 母权制民族社会

一、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山顶洞文化

山顶洞文化是1933年到1934年10月，在河北

省围场县周口店中洞猿人居住的山顶洞穴里发
现的。洞穴分上洞、中洞、下洞及后室。

下洞为一大圆锥形，内有大墓穴内有鸟骨等遗
物。多将山顶洞穴进入洞前，洞穴为野猪所
住，身上有野猪毛，山顶洞人将这些洞穴称
为“家”，地上生有住宅，下生有墓穴，不生有居处。

在洞中发现人骨化石，可推断出约有七个
男女老少不同性别个体。其中有一具男性大
骨架老人和两具未成年女性，头骨完整，其
他骨质不全，年龄不详。另外，
还有一个青年男性，身上领着西坡头骨脚趾。
这是一具仰之而之骨，下颌骨残缺，无“好”

五四·黃楊江中國文學上的人民族精神

尚 錢

尚 錢 手 迹

人美的勞動，被造出來生出享美的大學，
也被這大學的自己侵盡受虐的地位；被造出
壞了這人和毀滅世界為主德的魔鬼，也被造出
養人的能能殺世養生在更發廣的養育人體。人美
勞動的這大被造，被勞動訓練出來的有個個經驗
的頭腦，被到歌唱中，被到詩文上，被到歌樂
的聲音及色彩上，才以象形化的生命。
主觀的可謂的文藝呢？這種文藝，自社會發展
到把人美分成奴隸主和奴隸以來，由於一人砍
及配大女人的權，的行政，故非他人民私以私
財財主的享受，以及時制的商市自己個人力
量的过分地多，人美勞動這一優秀的被造，
便被少數人寄去，作為自己享樂或限制他人享
著的物。這裡首僅得利的社會，之才致人
而索取而僅是文藝的空壳——形式，而真正思
想及感情和配合起來的典型，形式反而毫無
全成矣。從衣被饋秀作品，却始終沒有顯示人
長大家。高爾基在「福斯聯文書」一文研究人類
的一脉於利説明：「那種在大革命之一件事
公私榮譽，是由民族——勞動民家的口頭被作而
造出來。」他又說，「這種『典型』的配合，



与研究生在一起

（1981年）

目 录

深切怀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尚钺同志(代序一)	尹 达	(1)
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和史学战士(代序二)	李 新	(7)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		(12)
关于研究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18)
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		(48)
关于编写与讲授本国史的指导原则		(69)
踏实钻研与坚持真理		(87)
与刘大年同志谈谈学术批评		(99)
有关我国原始社会研究的几个问题		(152)
如何理解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		(177)
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191)
中国史学工作应如何跃进?		(240)
华岗著《中国历史的翻案》序		(257)
山顶洞人的生产工具为什么这样少?		(261)
释禹		(272)
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		(295)
《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序言		(337)
《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序言		(349)

- 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354)
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 (358)

- 《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作者的
话及说明 (374)
《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序言 (386)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编者的话 (391)
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二三事 (397)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探索 (437)
《织工对》新探 (566)

附 录

- 尚钺年表 毛佩琦 (588)
尚钺著作目录 毛佩琦 (596)
编选说明 (603)

深切怀念马克思主义 史学家尚钺同志*

(代序一)

尹 达

尚钺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深深怀念着这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老战士，怀念着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尚钺同志一生的丰富的革命经历和坎坷的治学道路，在当代的历史学家中是少有的。他的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治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可贵的品质。

尚钺同志从中学时代起就追求进步，“五四”时期是河南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他追随鲁迅从事进步文学活动。他曾自发地深入到贫苦农民中去，组织他们迎接北伐。他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九二七年七月，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全国一片白色恐怖，革命遭到极大挫折的时期，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就将自己的生命和马克思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在革命运动中，做过党务工作、宣传工作，也做过军队工作、统战工作。他曾两次被捕入狱，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

* 这是尹达同志在中国史学会、北京市史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的尚钺同志学术纪念会上的发言。纪念会于一九八二年三月九日下午在北京举行。

忠贞不屈。由于党内错误路线，他曾一度被开除过党籍，但他依然是一心向着党，坚持为党工作。

他不仅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而且早在三十年代就是一位有影响的革命文学家。在严酷的革命实践中，他表现出战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论遇到怎样的挫折和艰难险阻，他都不曾停止前进的脚步。

四十年代初，尚钺同志出于革命的需要，转入历史教学阵地。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不仅为人民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工作者，而且在历史研究中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尚钺同志在对祖国历史的探索中，有他自己鲜明的个性和气质。他是在革命的文艺创作中，在革命实践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当他进入史学领域时，早已是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并且已经有了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他思想敏锐，眼界开阔，始终坚定不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他学习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他在去世前写的《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这篇文章里，还强调指出：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说，历史研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我们所应抛弃的是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阉割，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的态度。至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的历史研究离了它仍是寸步难行的。”

正因为他具有明确的理论指导，所以在历史研究中就能够抓住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他对中国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看法，在国内外史学界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他曾经形象地对一些同志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历史是躺着的；有了马

克思主义，历史就站立起来了。”他追随鲁迅之后，满腔热情地要寻找祖国历史的“脊梁”，使躺着的历史成为站立起来的历史。

尚钺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长期主持历史教研室和后来的历史系的工作，讲授中国历史这门课程。五十年代初，他根据自己对一些关键性的理论问题进行探索所取得的成果，组织教研室的同志编写讲稿，这就是由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这部《纲要》是建国后出版的第一本简明的中国历史著作。由于它理论一贯，通畅易懂，受到了学校师生和干部的欢迎，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在国外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尚钺同志在教学中认真严肃，要求极为严格。他所培养的许多史学工作者，目前已经成为史学界的骨干力量，在历史教学和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尚钺同志为人坦率开朗，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因而容易被人误解为“自以为是”。其实，他以一个革命的老战士进入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领域，常说他自己是“半路出家”的新兵，因而孜孜不倦，认真钻研。他虚心向前辈学习，向同辈请教，经常注意了解历史研究的新成果和出现的问题。他尊重前辈的成果，但决不随风转舵，人云亦云。不论是哪个权威的观点，他都要经过自己的探索，才决定然否。我曾同他相处多年，他这种勇于提出问题，敢于坚持自己学术见解的治学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尚钺同志所主张的“魏晋封建论”，以及关于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一些观点，在史学界有不同的认识，这本来应该在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经过同志式的讨论，使这些问题的研究深入下去。但是，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他的学术见解被不公正地说成是修正主义的观点，并且对他进行了批判。有一个时期，他甚至被剥夺了讲授历史和发表意见的权利。但尚钺同志始终以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坚定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不屈服于压力，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在一生最后的那篇文章里，在谈到百

家争鸣问题时，曾经这样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科学文化的正确方针。可惜的是，这一方针在相当时期内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使史学研究遭到莫大损失。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历史，是用它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并不是攫取其对于某一问题的具体的结论。如果我们的研究只限于使历史事实去适合某种论断，那么我们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社会在发展，科学技术在进步，理论也不能停步不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在我国虽然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勿宁说是刚刚开始，许多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谁能说哪一种结论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呢？学术上不应该有权力标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领导人，包括高级领导人在学术问题上的意见也只能是一家之言，要和不同的意见进行平等的讨论。学术工作者之间更要破除门户之见，提倡一种民主生动的学术空气，让各种意见在不断深入的研究中得到考验。”

这是他的临别赠言，是他的遗愿，也是对今后史学工作的诚挚的忠告。我既是他的同志，又是他的学友，过从较密，相知较深，对他的不公平的遭遇和长期困难的处境，我自己常常感到有某种责任和内疚。这里给我们以极大的教训。我们应当从中吸取经验，使之化为前进的力量，做好今后工作。我想这也是尚钺同志生前恳切的愿望。

在十年浩劫中，尚钺同志遭到“四人帮”的疯狂迫害，丧妻失子，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但是，他依然保持着革命者的本色，坚定不移，相信黑暗终会过去，胜利一定属于人民。他以富有远见的乐观精神，鼓舞着一同遭到“四人帮”迫害的同志渡过了苦难重重的岁月。他说：“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想凭借手中权力改变历史方向的人，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历史果然宣判了“四人帮”的死刑。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尚钺同志和同志们一起，紧张地投入了修订《中国历史纲要》的工作，同时积极参加对“四人帮”的批判。他愤慨地指出，“到了林彪、江青等野心家的手里，史学就完全不成其为历史学了”。“史学园地一时榛莽丛生，成了最无信誉最不干净的去处”。他深刻地揭露了“影射史学”的反科学的实质：

“有的人搞影射比附，从现实的政治模式出发，硬将历史上的某人某事指为今天的某人某事，不能不歪曲历史以削足适履。比如一些人硬把共产党的领袖和古代帝王拉上关系，使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些帝王忽而高大无比，文治武功浩浩荡荡，谁也说不得半点坏话，否则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嫌；忽而又一钱不值，一无是处，谁也再不提他的功德。皇帝忽而骂不得，忽而大家都来骂，这决不是研究历史的科学态度。”这些话，对于我们清算“四人帮”的流毒，我想是很有教益的。

尚钺同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根据他的切身体会，提出了要重视“史德”的问题。他说：

“古代史学家曾要求一个‘良史’不仅要具备史才、史学、史识，还要具备史德。我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要有一种史德。我想这就是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品格。那种善于察颜观色、探测风向，是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应具有的史德不相容的。史学工作者应该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拿出独立的研究成果，去丰富历史科学的宝库，即使不是珠玑，哪怕是砖瓦也好。如果今日某人曰‘此’，则纷纷撰写文章曰‘如此如此’。明日某人曰‘彼’，又绞尽脑汁撰写文章曰‘如彼如彼’，这不是研究历史，只能是糟蹋历史。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应该能识别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真理。历史学家研

究历史，历史也将考验他们的研究。”

尚钺同志这段话讲得十分透彻，十分亲切。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了这么一大段，是因为当我读到他这篇文章时，眼前展现着他那种刚毅果敢的老战士的风骨，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给人以巨大的感染力。应当说具有这样的史德，才不愧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

尚钺同志和所有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一样，对党无限忠诚，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我们的人民今天正在谱写历史的新篇章。尚钺同志的临终遗言说：“我希望史学园地百花盛开。我们留给子孙后世的，不应该是鏖战之后的残垣断壁，而应该是一座五彩缤纷的大花园。”我深信，我们史学界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前进，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促使史学园地出现百花盛开的局面，尚钺同志的遗言一定能够成为现实。

一九八二年三月七日

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和史学战士

——痛悼尚钺同志并纪念他的八十诞辰

(代序二)

李 新

革命需要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参加，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取得成功。但知识分子也有其先天的弱点，最主要的便是缺乏革命的坚韧牲。如果不和工农劳动人民相结合，并从而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是难于坚持革命到底的。试看中国革命的历史，每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何其多也！而当革命进入低潮，特别是当革命遭到突然打击而归于失败的时候，离开乃至背叛革命的知识分子又何其多也！尚钺同志是个知识分子。但他却不是在革命高潮中赶浪头，在革命失败后开小差的知识分子。尚钺同志的一生，他走过的政治道路是极其坎坷不平和充满艰难险阻的。但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共产党人的气节，从未向敌人低头，绝不肯二三其德。他在学术上也受到过无情的批判和打击，但他总要坚持其自信为正确的见解，而不肯在高压之下屈服。即使被迫作检讨，也很少违心之言，总要保留他的意见。在晚年和疾病作斗争中，尚钺同志也表现出他的顽强的性格。不管病情好坏，他的精神总是愉快的，怡然自得，毫不悲观。我从一九四八年

* 这是李新同志在尚钺同志学术纪念会上的发言。

认识尚钺同志以来，虽然在中国历史的几个基本问题上并不同意他的学术观点，对他的某些作风也曾有所批评和规劝，但对他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性格，始终是敬佩的。虽然在职务上我经常居于领导地位，但我对他一直以前辈相尊，因此我们相处甚欢，毫无嫌隙。我国经过十年浩劫，现在正处于由乱到治的大转变过程中，我们的党风需要整顿，我们的“士风”（知识界的风气）更需要整顿。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一个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肯当投降派，也不肯当“风派”的坚强战士，这对于我们的党，对于我们知识界特别是史学界，该是多么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啊！

尚钺同志是“五四”运动中河南学生界的活动分子，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工作。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遭到失败，许多动摇分子脱离革命的时候，尚钺同志却在这年，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党。十一月，他奉命回到故乡——河南罗山，发动并领导了罗山、光山一带的农民，举行秋收起义。这支起义队伍后来撤退到四望山打游击。一九七二年，我们社会科学部的“干校”搬到了河南明港，这里离四望山不远，能遥遥地望见它那巍峨的山势。当我向同志们谈起尚钺同志曾在豫南地区发动过秋收起义时，许多同志都不知道，但一听到之后，都对他顿时引起了敬意。

尚钺同志早在一九二六年即在家乡组织农民协会，参加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他能回豫南发动秋收起义，就是因为他在那一带已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尚钺同志以后又在上海和东北的一些城市里参加过工人运动。正是由于能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他才能坚定地信仰马列主义，坚持革命到底。现在人民大学的罗老鬚渔同志（南昌起义的参加者，十一军的领导人之一），曾和尚钺同志一起在上海从事过工人运动，他们因此而建立了终身的友谊。老一辈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家，能坚决地摆脱旧社会上层家庭的束缚，勇敢地投身于工农大众的革命斗争中去，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后辈